

刘云久 著

第二次国共合作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国共合作

刘云久 著 1985·哈尔滨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张乙迪

第二次国共合作

Dierci Guogonghezuo

刘云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34/16·插页2·字数63,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200

统一书号：11093·158

定价：0.56元

0272/67

总 序

历史是一面镜子。对照这面镜子，人们才能够更全面、更清楚地看清现实和看清自己，才能够认准前进的路子。这个道理对于个人，对于整个国家社会都是适用的。我们的祖先直称历史为“鉴”，应该说这对历史的本质和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是有深刻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的正确思想路线，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把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国情，当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出发点。而今天的中国又是昨天和前天中国的继续和发展。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昨天和前天的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研究和了解中国国情，这个任务本身，就包含着研究、了解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两个方面的内容。就当前来说，只有全面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才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可见研究和学习中国革命史，特别是研究和学习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涉及我们党制定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大问题，是涉及每个同志理解和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大问题。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的确，历史是不会重演的，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无论实践的内容或斗争的形式，都不可能完全是历史的重复，甚

至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总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先人的革命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伟大力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间，我们的祖国是灾难深重的。因此，我们的先辈发出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呼号，他们牺牲救国的业绩是可歌可泣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斗争，更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的新社会。一个遭受过百般凌辱的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的逻辑非常明确：我们这一代，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要继承我们先人的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再向前推进，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

总之，我们认为，研究和学习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学习和研究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

这套丛书是我们编写组的同志们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习作。我们力图把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在书中反映出来，并把现代革命史的重大斗争事件，以专题的形式，逐个写出，汇成丛书，使读者单本读来可以了解一件革命运动的历史，全部读来又能掌握整个现代革命史的概貌，为当前广大干部和青年的空前的学习热潮做一点贡献。

由于我们水平很低，错误一定很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唐纯良

一九八四年春

目 录

总序

前言..... 1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一) 亡国灭种的威胁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提出..... 3

(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20

(三) 芦沟桥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32

二、国共两党的抗日合作及其伟大历史作用

(一)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较好的合作关系和全国抗战局面的开辟.....37

(二) 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全国抗战局面的坚持.....53

(三) 抗战后期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战争的胜利.....70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图谋和国共两党的谈判与斗争.....81

(二) 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91

结束语.....95

前 言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疯狂地进行“剿共”战争，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中国的内战，给早已觊觎中国，妄图称霸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造成武装侵略中国的良好机会。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既定国策”，一九三一年九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三个多月时间就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一九三五年它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再把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捐弃了十年内战的血仇，号召停止内战，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但是，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他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也遭到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日益强烈的反对。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答应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得以停止，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

入中国，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最后形成，终于，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争取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只是由于国民党在这次合作中始终坚持它的反人民的立场，才造成了合作中的斗争，最后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学习第二次国共合作史及其经验，对于我们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平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建设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国共两党之间，经过了长达十年的内战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形成了第二次合作。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新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国共合作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分不开的。

（一）亡国灭种的威胁和第二次 国共合作的提出

日本统治阶级，自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它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就实行了一条对外扩张、掠夺的路线，不断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给日本造成独霸中国的机会，一九一五年，它利用袁世凯称帝之机，强迫中国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没有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一九二七年七月，田中义一在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

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①。日本天皇批准了此奏折，从此，先从东北下手，逐步灭亡中国即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

一九二九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很快袭击了日本，致使日本社会呈现一片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对外贸易骤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数激增。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便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它的一个“救命符”，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悍然走上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道路。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事变完全采取了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九月十一日，蒋介石通令东北军说：“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幻想依赖国际联盟，以待“公理之解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仅三个多月时间，整个东北就被日寇占领。

日寇占领东北三省以后，为进一步扩大侵略，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由蔡廷锴所领导的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但是，蒋介石不仅不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而且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536页，黑龙江出版社1981年3月版。

定》。出卖了“一二八”上海抗战。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推行其“大陆政策”，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满洲国”，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面前，蒋介石反动政府却节节退让。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退让，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派宋哲元为主任。之后，蒋介石又让何应钦到北平处理华北问题。何到北平后，为满足日本侵略者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立即着手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十二月十八日，这个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本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曹汝霖等人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北平宣布成立。至此，华北已置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下。

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出现了严重危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这就给中国的各阶级和各党派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只有动员一切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反蒋旗帜，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决议，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各军队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议”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

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著名的抗日六大纲领^①。这个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分析，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策略，并具体指出中国应“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会议还批判了单纯搞下层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制定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八月一日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它不再局限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行各业各个民族的联合，宣言提出了“有钱出

①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六大纲领是：（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共同打倒日帝。

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虽然未把蒋介石集团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主张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并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为了宣传“八一宣言”精神，促成国共合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创办了《救国报》^①，该报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全文刊载了“八一宣言”。以后连续报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向全国人民宣传了抗日救国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北平青年学生，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冲破了国民党政府沿街设置的层层封锁线，进行抗日请愿，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英勇斗争。“一二九”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潮流，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而共产国际

^① 《救国报》1935年5月在莫斯科创刊。该报在莫斯科编辑排版，在法国巴黎印刷并向国内发行。同年12月改称《救国时报》，1938年停刊。

“七大”召开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就为中共中央解决这一重大政治路线问题准备了条件。

为了分析“华北事变”以来国内的政治形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深刻地分析了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规定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阐述了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以及各项政策的相应变化；指出了当时主要危险倾向是关门主义。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的遵义会议以后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转变的关键。会议以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全面地阐述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是指导和组织国共合作的重要文献。

《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指出：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①，这种形势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任务就是把各个革命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②《报告》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6页。

深刻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指出了它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科学地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的特点是动摇。在新的形势下，他们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即使其右翼也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报告》还深刻分析了国民党营垒的内部矛盾。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铁板一块。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所造成的。在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事实上已经有了这种迹象。因此，“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他们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否认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他们也看不到革命势力还有严重弱点，从而否认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关门主义把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力量关在门外，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党要担负起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3—144页。

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①。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要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善处同盟者，要认真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克服中国共产党内的关门主义，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历史转变的标志。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逐步实现国共合作，积极开展了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工作。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处境和情况。张学良的东北军曾积极追随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先后“围剿”过鄂豫皖红军、北上抗日的红军和陕北红军。但是，东北军是“杂牌”军，深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歧视，同蒋介石存在种种矛盾；东北军的官兵多数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他们背井离乡，流亡到关内，在官兵中的怀念故土、厌烦内战、要求抗日的思想不断增长；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和“剿共”战争的挫折中，使张学良及其部队的广大官兵，逐步认识到跟随蒋介石进行“剿共”战争没有好下场，只有实现联共抗日才有出路。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实现联合抗日是完全可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2页。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是比较早的。东北军进驻西北地区之后，曾奉蒋介石之命，积极地进行“围剿”陕北红军的内战，一九三五年九月，东北军一一〇师进攻红军，在劳山地区遭到红十五军团的伏击。同年十月，东北军在榆林桥战斗中，又遭到了红军的严重打击。在这次战斗中，东北军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为红军所俘。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最初的争取工作，是从释放高福源开始的。高曾作过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张学良对他是比较信任的。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使高福源受到感动和教育。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地担负了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东北军，张学良接见了，高福源向张学良宣传了红军官兵亲密无间的关系和优待俘虏的政策，说明了红军联合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造成的国破家亡的苦难，指明了东北军联共抗日的出路。张学良听后，很受感动，便说：“你谈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选择联共抗日这条路，是选对了。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先休息两天，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①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高福源折返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张学良关于联共抗日的态度。从此，就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七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

① 《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99页至100页。